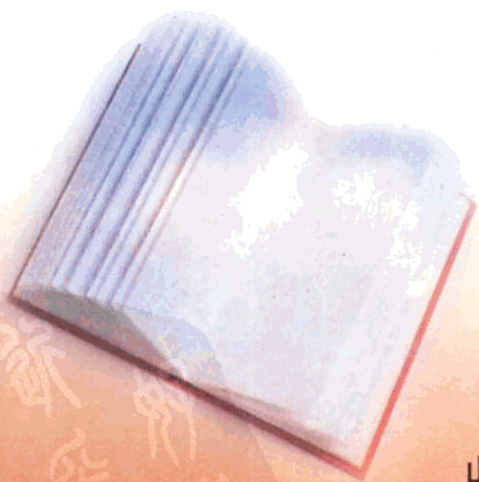


● 罗郁聪 著

现代社会主义论

——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之中国特色



山西经济出版社

XIANDAI SHEHUIZHUYI LUN

● 罗郁聪 著

现代社会主义论

——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之中国特色

山西经济出版社

XIANDAI SHEHUIZHUYI LUN

书 名： 现代社会主义论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之中国特色

作 者： 罗郁聪
出版者： 山西经济出版社(太原市并州北路 69 号·
邮码:030001·电话:4044102)
发行者： 山西经济出版社
排版者： 山西经济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刷者： 太原红星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4.375
字 数： 369 千字
版 次：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36-212-6 / F·208
定 价： 22.00 元

责任编辑 张惠君 复 审 王宏伟 终 审 张凤山

前 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进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我已是从教30年、年逾半百的高校教师。

1943年起我就读于厦门大学经济系,1944年下半年开始直接受到当时民主教授王亚南、郭大力等老师的马克思主义启蒙和熏陶。从此以后,我“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政治经济学”(王亚南师经常这样对他的学生说,或者说:“应当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来研究经济学。”),联系解放前后的实际情况,逐渐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同时,也产生一些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特别是50年代后期所谓“三面红旗”的疑虑问题。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讲授《资本论》、《反杜林论》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著作的教学和科研中,我深刻体会到列宁的见解——“要正确评价马克思的观点,无疑需要熟悉他最亲密的同志和朋友恩格斯的著作。不了解恩格斯的全部著作,就不能了解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全面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反过

来,“要了解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有什么贡献,就要清楚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学说和活动对于现代工人运动发展的意义。”所以,长期以来我不仅认真学习《资本论》和马克思的其他论著,而且深入钻研《反杜林论》和恩格斯的其他论著。

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从80年代开始,近20年来,我把长期学习钻研所积累的资料加以整理,写成了第一本书——《恩格斯经济思想研究》。这本书稿是对恩格斯关于广义政治经济学框架体系建构之贡献的阐述,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接着,继续整理资料并写成《恩格斯与〈资本论〉》。这本书稿是对恩格斯关于《资本论》主要理论观点和体系创立之贡献的阐述,由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最后,趁热打铁,继续整理资料并同哲学系苏振富教授合作写成《〈反杜林论〉研究》。这本书稿是对恩格斯关于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作为有机整体并着重指出其内在联系之贡献的阐述,由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这三本研究恩格斯思想的学术专著,自然而然形成了一套小系列丛书。与此同时,我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及其基本原理,分析研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探索斯大林逝世后前苏联改革理论和实践以及导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的深层原因。我一直怀有一种不完全是多余的担心;抱着坦诚祈求、希望我国改革开放实践能获得健康发展的心情,密切关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情况,反复思考,倘有一得之见,成熟一个问题写一篇文章,大胆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从1979年开始,在撰写上述三本书的空隙,公开发表了25篇文章。这类文章也自然而然形成了一套以“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之中国特色”为主题的系列论丛。

现在,为了求教四方,我把这些系列文章汇集在一起以专著形式出版,内容包括三部分:一是25篇文章,标题为“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之中国特色”,这个标题也是书名《现代社会主义论》的副标题。二是以“对恩格斯关于现代社会主义理论观点的阐发”为标题,收入《〈反

杜林论》研究》一书中的第15~21题7个专题。三是编辑文集时新写的“增补”。已发表和出版的论著保持原样,前言、引论、分组文章之间的插话、后语等不同程度地添上一些新的内容,我统称之为“增补”。这样做既可使已形成的观点显示出内在联系,加强立体感,又能针对新情况、新问题谈谈新观点,或阐发原来观点经过反思之后的改正、减略和充实,以表明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所达到的水平。

我已经76岁了,从青年到老年,整整半个世纪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当了一辈子教师。50年来自认为尚能读书不惟书、尊上不惟上,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然而,世界变化太大了、中国变化太大了!在21世纪新时代即将到来的世纪之交,我一定遵照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努力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在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指引下,为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而献出自己的余热。这是我出版这本书的初衷。

出版这本专著形式的文集,是我多年的愿望。愿望之由可能变为现实,应当感谢厦门大学经济系领导庄宗明、方成族等同志的支持;应当感谢经济系蒋绍进教授、王锦涛教授,哲学系苏振富教授的长期合作。新建立的山西经济出版社,一出现就是一个好形象——一套《当代中国经济学家文丛》,既注重社会效益,又提倡百家争鸣,把国内各派之知名、不知名的专家、学者大量邀请参加,同时还接受了我以专著形式出版文集的要求。特此向张凤山社长、张惠君副主任表示感谢。

引 论

前车之鉴与走自己的路

—

当我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的时候(1944年下半年),马克思主义理论早已由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变成现实;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令人无限神往。但是,现实的“此岸世界”被封锁了,可望而不可及。幸好,经过近32年,我们也解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紧接着也走上了社会主义大道。我第一堂授课的专题就是“掀开‘铁幕’看苏联”。当时,虽然对社会主义苏联知之甚少,尚能讲得十分生动,如见庐山真面目,大家欢欣鼓舞!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和第二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出现,同苏联一起形成了统一的和强大的社会主

义阵营,而与资本主义阵营相对立。相应地,同时形成了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统一的世界市场瓦解了。苏联和美国是两个超级大国。在这种形势下,我们亲眼看到也亲身体验到,一方面是社会主义阵营处在一片凯歌声中,而另一方面,正如斯大林所说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从而,资本主义阵营对社会主义阵营“实行经济封锁,想以此窒息它们”。更有甚者,“他们竭力想用‘马歇尔计划’、侵朝战争、军备竞赛、工业军事化来解脱这些困难情况”。^①然而,我国抗美援朝的胜利,打退了美国侵略者的进攻。

二

众所周知,斯大林逝世之后,社会主义阵营中“老大哥”的情况出现新变化。

赫鲁晓夫上台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国家对集体农庄的领导职责完全交给地方机关,取消了由国家自上而下下达计划指标的做法,对农业生产只规定农产品的采购总量,价格也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从而使集体农庄有了较大的自主权和主动性。更重要的是解散和改组国有国营的机器拖拉机站,将其所有设备卖给集体农庄,试行小组包工奖励制,使劳动报酬与终极成果直接联系起来。这一来,既壮大了集体农庄又更进一步调动了劳动积极性。当然,这种趋向同斯大林对如何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水平的设想,背道而驰。正如赫鲁晓夫所说的:“把历史的车轮拉向后转。”^②其次,在工业、建筑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管理体制方面也

^① 参阅《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52年单行本,第23、24页。有关利别尔曼学派主张的资料,请参阅《苏联报刊关于利别尔曼建议的讨论文集》,三联书店1963年版。

^② 参阅《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52年单行本,第73页。有关利别尔曼学派主张的资料,请参阅《苏联报刊关于利别尔曼建议的讨论文集》,三联书店1963年版。

进行改革。这方面的改革主要表现在将各部门(条条)行政组织的管理改为地区(块块)行政组织的管理,从而使斯大林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受到一次很大的冲击,触动了前苏联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第三,特别必须注意的是,当时应运而生的利别尔曼学派对改革实践的理论观点。这个学派的主要主张:①他们认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可以而且应当加以规定的是,一切投入社会劳动的领域、一切生产部门和一切消费方向的发展上的总的比例、增长的速度和最优的对比关系。”也就是说,中央计划机关下达给企业生产单位的指令性指标,只需要品种的产量、交货期和赢利额三项指标就行了。其余指标由企业根据这三项指标自行制定。②上述三项由国家下达的指标中,以赢利额即利润率为核心,而且把赢利和奖金直接挂钩,以贯彻职工个人利益与企业集体利益相结合的物质鼓励原则。这一来,建立国民经济管理计划体制的同时,也就建立了整个企业经营活动的动力机制。③与此同时,由于企业在国家领导下实行经济核算,具有较大的生产经营独立自主权,从而,国家与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不论是生活消费品或是生产资料,必须按其价格进行商品交换,不能无偿调拨。而且,“逐步地把物质技术供应转移到有计划的批发轨道”。至于资金供应,是按商品交换的办法收取利息,在利润分配上“采用企业按份额分享利润的原则”,放弃把闲置利润余额的固定数上缴预算的做法。企业与企业之间强调竞争。由此可见,按照这个学派的主张,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重建”起来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几乎已经不存在斯大林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不仅违反了斯大林的主张——“为了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必须将集体农庄生产的剩余品从商品流通系统中排除出去,把它们纳入国家工业和集体农庄之间的产品交换系统。”而且,甚至会出现斯大林所警告的更糟的情况,即如同“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里批评杜林主张的在商品流通条件下活动的‘经济公社’时,确凿

证明商品流通的存在必然会使杜林的所谓‘经济公社’走向复活资本主义的地步”。^①

不论是赫鲁晓夫的实践措施还是利别尔曼学派的理论观点，都与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遗嘱”和经济管理体制的苏联模式发生严重程度不同的抵触。对此，当时，50年代和60年代初，苏联经济学界曾展开了热烈争论。这一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辩论，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引起了我国的强烈反应。从1963年初开始经历三年的反“苏修”情况，记忆犹新。结果是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接替赫鲁晓夫上台，强调改革要谨慎、稳重。从此，改革实践拖延了18年，苏联的国民经济基本上处于临近停滞状态，整个社会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

不能再拖下去了，改革迫在眉睫。当然，也可能受到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影响。1982年11月，安德罗波夫上台立即提出苏联“正处在发达社会主义这一漫长历史阶段的起点”，号召大家必须解放思想、正视现实，进行经济政治改革。此时，应运而起的是以阿甘别吉扬院士为首的西伯利亚改革学派。这个学派通过自己办的刊物，直接宣传他们的改革思想和政策主张。他们着重指出过分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把民主原则置于行政管理重压之下，既不能调节好国民经济按比例的发展，也不能调节好劳动者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他们指出这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矛盾的表现。这种理论观点否定了斯大林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会自动适应”、“不会发生矛盾”的观点。据此，他们主张必须“打破这种体制，代之以一种采用经济杠杆和扩大民主（以抵消官僚主义）为基础的管理体制”。在新的经济管理体制中“劳动者集体可以决定企业的发展政策，批准他们所在企业的发展计划”，有权选举自

^① 参阅《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52年单行本，第75、74页。有关利别尔曼学派主张的资料，请参阅《苏联报刊关于利别尔曼建议的讨论文集》，三联书店1963年版。

己企业的“各级领导人”。换言之,在新的经济管理体制中,企业成为独立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它按照完全经济核算的原则办事,自筹资金、实行自治”。当然,他们同时明确指出,这种新的经济管理体制或经营机制,是“社会主义经营的形式和方法”,或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他们称之为生产关系的“亚系”,即生产关系的外部层次,也就是涉及了作为物质基础的生产力和上层建筑。据此,他们还进一步否定了当时苏联理论界流行的在商品货币关系上的“外壳论”和“暂时论”,以及把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对立起来的看法。他们认为,商品货币关系不是从资本主义那里引进的,而是由苏联企业联合公司的活动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市场也不是资本主义的发明,而是任何一种建立在发达的分工和以商品进行联系的基础上的体制都具有的一般特征。所以,他们主张对苏联经济体制实行根本性的改革,中央计划只规定指导性的国民经济最基本的比例关系,作为企业具体计划的“出发点”,从而,以企业作为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的结合点,形成了西伯利亚学派对前苏联经济体制改革总设想的基础。^①

以西伯利亚学派理论观点为指导的、安德罗波夫主持的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大规模试验,就是着重于扩大企业自主权、增强企业内部活力。这场试验不到三年,再经过同样短暂的契尔年科时期,到了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接着上台,才积极准备继续进一步扩大起来。

1986年2月25日~3月6日,苏联共产党召开了举世瞩目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大会批判地总结了20多年来苏联改革实践所走过的道路,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再认识,制定了“全面完善社会主义”的新党纲,通过了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和2000年前的任务,进一步确定了“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和进行全面改革的方针。

^① 参阅阿甘别吉扬:《改革,苏联的双重挑战》。本文摘句均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报刊复印资料《外国政治,国际关系》1988年第6期。

当然,这个时候西伯利亚学派的理论观点已经被吸收、形成了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这个《新思维》是他重新思考了苏联 70 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以及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得出的结论。1987 年 11 月,在纪念十月革命 70 周年之际,出版了《改革与新思维》。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建设成就是无容争辩的,同时,也潜伏着严重的危机,非进行改革不可。他们认为,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必须向列宁求教,特别是“列宁关于必须考虑客观经济规律要求,关于计划工作和经济核算,关于善于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物质刺激和精神刺激的论点”。改革实践一定要发扬社会主义自治,鼓励主动性和自主性。这样才能既“把社会主义和民主结合起来”,依靠群众生机勃勃的创造活动,打破一切障碍“使科学技术革命的成就同计划经济结合起来”,又可“从上到下,从经济基础、所有制关系到上层建筑的整个社会”进行改善和更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就是革命”。他们强调这场革命就是“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完全恢复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构想”。也就是说“列宁的党在 1917 年十月革命日子里所开创的伟大事业的直接继续”。^①

然而,这场革命没有继续进行下去!工人阶级政权崩溃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瓦解了。“苏联既唱了社会主义的凯歌,又为它奏了挽歌!”^②

三

不过,接过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红旗而建立的第二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今仍然高举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跨越世纪之交继续奋勇前进,从胜利走向胜利!

现在,我们回顾前苏联既唱凯歌又奏挽歌的历史,目的在于总结

① 参阅《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 1987 年版。

② 胡绳:《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人民日报》1994 年 12 月 27 日。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前车之鉴与走自己的路。以达到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并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兹以我的学习所得，谈如下一些个人肤浅看法。

1. 根据上述前苏联、中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革命和建设成功事实(当然不是指最后胜利)，可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下述基本原理是科学的，从而是正确的：“以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和社会历史发展的经验为基础而得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当时在西方一些国家正在成熟起来的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的本质的全面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中必然要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理论。关于建立能够担当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工人阶级政党的学说等等。”^①我们一定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之。

2. 世界风云突变，社会主义事业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中的遭遇，可以说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最大的挫折。但是，这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性的反证，而是实践中很难避免的失误。以前苏联为例来看，斯大林逝世之后，前苏联共产党没有经过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充分准备，匆促行动，以致经济体制改革虽然及时进行，甚至在有了中国初步成功经验为榜样的时候，反而中断了。

众所周知，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没有被帝国主义联军扼死在摇篮中，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红军能把兵临城下的武装到牙齿的德国法西斯侵略者打败，可以说这是主要依靠工人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尤其是发挥了社会主义阵营经济合作和互助的力量。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斯大林曾说：“这个合作的经验表明，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能像苏联那样给予各人民民主国家以真正的和技术精湛的帮助。问题不仅在于这种帮助是极便宜的，技术上是头等的。问题首先在于这种合作的基础，是互相帮助和求得共同经济高涨的真诚愿望。结果，在这些国家中便有了高速度的

^① 胡绳：《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人民日报》1994年12月27日。

工业发展。”^① 这些全是事实。然而，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事实。这就是 1924 年列宁逝世，新经济政策代替战时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时期”才开始起步，斯大林就高度集中力量，按照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优先增长的重、轻、农顺序高速度进行工业化。1927 年社会主义工业化完成（斯大林只用工业产值所占比重大小来衡量工业化，是不准确的），接着 1928 年展开农业全盘集体化。到了 1936 年在公布《关于苏联宪法草案》时宣称苏联“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又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如果以 1921 年实行新经济政策算起，15 年时间，竟然在俄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在全苏联建立了《哥达纲领批判》中所预言的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个速度不能说不快了。再过 15 年，经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考验之后，前苏联跃居为世界上与美国并列的超级大国，那就更是令人惊奇！

惊奇中包含更多的情绪是喜。不过，几乎同时，斯大林逝世后，很快就转喜为忧，困惑！为什么赫鲁晓夫一上台就要实行经济改革？而我国当时却正如同“被胜利冲昏头脑”，高举三面红旗，按照苏联模式要以比前苏联更快的速度“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随后的三年困难时期，没有能使我们头脑清醒，在向外进行了三年反“苏修”之后，还接着转向国内再展开 10 年“斗私批修”——“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动乱。在此期间，前苏联的改革几乎终止了。一静一动，对比悬殊。

十年动乱，乱出个中国命运的大转折！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把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确定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号角吹响了，改革开放，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

^① 参阅《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 1952 年单行本，第 29 页。有关利别尔曼学派主张的资料，请参阅《苏联报刊关于利别尔曼建议的讨论文集》，三联书店 1963 年版。

路。

拨乱反正,不仅使中国的发展转上正轨,而且,也促使前苏联的改革恢复进行。这时候,我逐渐消除困惑,转忧为喜。喜的是接替勃列日涅夫上台的安德罗波夫号召解放思想、正视现实,特别是他指出苏联“正处在发达社会主义这一漫长历史阶段的起点”。随后戈尔巴乔夫的提法也只是“全面完善社会主义”,二人都是以西伯利亚学派的理论观点为指导的。可以说,包括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许多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路线、方针、政策,都可能受到中国改革理论和实践的影响。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而前苏联的一套又一套的设想却无法实现。但是,二者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何况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基本上是按照苏联模式进行的。所以,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因是共同的,改革的方向、道路、目标也是一致的。前文已粗略介绍过赫鲁晓夫和利别尔曼学派、戈尔巴乔夫和西伯利亚学派的理论观点,恕不赘述。这里再举二例说明超阶段发展问题。

一是苏联建设社会主义时由于主客观原因,不得不高度集中力量、高速度行进,从而必然造成超阶段发展。超阶段发展在生产力方面出现的情况,戈尔巴乔夫称之为“荒谬的局面”,他说:“苏联在钢、原料和燃料动力资源生产方面规模巨大,早已无可匹敌,同时却由于浪费、无效的利用而又缺少这些东西。苏联在粮食生产方面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但却每年购进几百万吨谷物做饲料。按每个人平均计算的医生、医院床位最多,但同时 in 医疗服务中又存在严重缺点,服务质量下降。我们的火箭以惊人的准确性找到哈雷彗星并飞上金星,而在取得这一科学和工程成就的同时,却在为了国民经济的需要而采用科学成就方面明显落后,我们的许多家用电器落后于现代水

平。”^①这是一个很生动的,在中国也可以看到不同程度的类似情况的现象。

二是超阶段发展在生产关系方面出现的情况。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斯大林一方面批评苏联的经济工作人员计算生产量“侈谈空想出来的‘大概数字’”,而不考虑到价值规律,不考虑到“具有现实的意义”的“经济核算和赢利问题、成本问题、价格问题等等”。^②同时,另一方面却念念不忘:“我们还没有发达的产品交换制度”,他主张“应该一往直前、毫不犹豫地推行这种制度,一步一步缩小商品交换的活动范围,而扩大产品交换的活动范围”,这样才能“把集体农庄的基本财产、集体农庄生产的产品纳入全民计划的总系统中”,从而“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使社会主义易于过渡到共产主义”。^③

脱离物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片面提高生产关系公有化程度的超阶段发展情况,1936年斯大林宣布苏联建立了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一个表现。此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正如《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所说的,“一往直前、毫不犹豫”。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赫鲁晓夫和利别尔曼学派的改革理论和实践,安德罗波夫对苏联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新提法,以及西伯利亚改革学派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理论和实践都是为了纠正超阶段发展。

3. 前苏联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都有纠正超阶段发展这个先决条件问题。也就是重新确定本国改革当时“现存社会”(马克思语)所处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中国确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就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处在初级阶段”。苏

① 参阅《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

② 参阅《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52年单行本,第15页。有关利别尔曼学派主张的资料,请参阅《苏联报刊关于利别尔曼建议的讨论文集》,三联书店1963年版。

③ 参阅《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52年单行本,第76页。有关利别尔曼学派主张的资料,请参阅《苏联报刊关于利别尔曼建议的讨论文集》,三联书店1963年版。

联是“正处在发达社会主义这一漫长历史阶段的起点”。我的理解，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同是科学社会主义，其本质是一样的。但是，前者所谓“发达社会主义”，是指《哥达纲领批判》中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而后者则不然，我们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尚未达到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不过，也不是“过渡时期”。这就是“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涵义。我曾说过，“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也就是把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之社会主义社会的概念扩大；扩大后的社会主义社会可划分为高级阶段即原来意义的第一阶段和低级阶段即新意义的初级阶段。换言之，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或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就是指对比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扩大概念后的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来说，相对地不发达、不完善、不成熟。但是，同“过渡时期”对比，在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中，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其中的全民所有制经济即国有经济（包括国有独资公司和国家控股公司）发挥主导作用。这就是当前经济体制改革——攻坚战实践中所必须争夺的阵地。这也就是我国 70 年代曾经争论过的关于我国社会性质问题的焦点。^①

前苏联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断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也就是说，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进而言之，邓小平理论是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当今时代特征结合起来，“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因而，我们必须牢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

^① 参阅本书第二组第一篇文章。这篇稿件只是我自己研究所得到的结论，当时对有关争论情况毫无所知。原投《经济研究》，编辑部已用红笔编排后退回，说是接到临时通知，不再发表此类文章。